

輿論安能造乎



李克因杂文精选

李克因 著

金城出版社

輿論安能造乎

李克因雜文精選

李克因／著 李風宇／選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舆论安能造乎：李克因杂文精选 / 李克因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155-0976-1

I. ①舆… II. ①李…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6060号

舆论安能造乎

作 者 李克因
选 编 李风宇
主 编 朱铁志
出 版 人 王吉胜
责任编辑 柯 湘
文字编辑 彭洪清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976-1
定 价 49.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政编码 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577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李克因（1925—2006），原名李利之，河北省人。中央大学毕业后即从事记者、编辑等工作，曾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曾用林尚之、荔之、李泗、林子、吴林等十余种笔名写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笔耕六十余载，共发表杂文等文学作品两千余篇，出版杂文集多部，所著多篇杂文收入《新文学大系·杂文卷》等选集，并获近百种文学奖励。

李克因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

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

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前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

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已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

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假如我是杂文家（代序）

李克因

杂文天地广阔无边，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许多学问应该钻研，许多技法需要掌握。而我接触了若干年，自感盲目性很大，只顾埋头去写，极少研究理论，所以于理论上说不出什么道道。这里只凭直觉，写点想法，并仿叶至诚先生《假如我是作家》一文的命题，定了这个题目。

假如我是杂文家，我将继续考虑自己对杂文属性初步认识的是非。这牵涉到杂文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鲁迅的杂文及杂文观无疑必须学习、继承和发展。我从中悟到，若论“自然属性”，杂文就是“杂”。杂者，多样也，即内容、体裁、手法的丰富多姿，不拘一格。当文学看，它是散文的一个分支，它以议论为主而区别于抒情、状物、叙事为主的散文。至于“社会属性”，则由作者凭自己的思想观点赋予，“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地老话：个人。不可能、也无需去强求千篇一律。当然，由于现代杂文传统延续和积累，它已形成的总风格比较宜于直面人生，用讽刺、鞭笞等手法，向阻碍社会进步的事物进行战斗。但凡事

无“绝对”。杂文也可歌颂，即使既非“歌”“又非战”的中性议论，有助于“杂”。

我的毛病在于远不够“杂”。即如体裁，就往往是以第一人称发议论的一个模式。于此，当然鲁迅高明。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明确提出：“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有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起，于是成了‘杂’。”显然，这是从“自然属性”上着眼的。1934、1935、1936年的三集《且介亭杂文》中，论形式，固大多为已通称杂文，即常为报纸副刊带头的那篇号称“千字”的言论性文章；也还有书序、书跋、墓志铭、答客问、书信等体，确实“杂”得很。如果现在有人写这类文字，很可能被有的同志否认为杂文。他还有一些长达几千字的“鸿篇巨制”，完全不符合“千字”规范，若在当今，怕也难以被有些选家收入杂文汇编的。

文章应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是鲁迅在同一序言中所说的有关为文的“社会属性”的名言。当然也是三集《且介亭杂文》的指导思想。在有些场合，他也曾把杂文当成一种战斗性的文体提过。但又是凡事无“绝对”。三集共一百多篇文字，也并非皆是投枪、匕首。首集中，就有《连环画琐谈》、《看图识字》、《木刻纪程》、《随便翻翻》等可以称之为文化随笔的作品。这就从另一方面体现了鲁迅杂文的“杂”。这是符合生活逻辑的。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个具有独特性格和七情六欲的人。他喜欢逛书摊、看电影、吃小馆（在一定意义上讲，他是位“美食家”）、抽烟卷（虽然要求并不高，有时也会跟老伴闹别扭，赖在地上不起来）。他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作为一个人来说，伟大的战斗者鲁迅也是多侧面的。这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文字中去，因而总的说作品主弦既突出，“次弦”也相应配合，形成一部战斗而又跌宕有致的丰满的交响乐。也可说是多侧面的，“杂”的。学鲁迅的文首先应学他的高尚品德、硬骨头、爱憎分明精神。学其文也不宜死学，否则初看虽能“乱”真，也不过形似而已。

鲁迅自称是“摆地摊”的，“所有不过几个小钉、几个瓦砾”。那么我，充其量只能算个“捡破烂的”，用幼稚的眼光看世界，捡到什么“卖”什么，确实是无足取了，但总还希望能捡到点稍微于世有益的东西。

假如我是杂文家，我将把它作为“入学”来对待。文学属人文科学范畴，杂文又在文学的圈圈之内，或者说与新闻学有点“血缘”关系，因而成为一种“边缘”文学品种。它要干预生活，但正如有些同志所说的，它首先是干预人的灵魂，而不是直接去干预政治理论、政策：如有这个设想，也是通过干预人而达到。

我想，不论干预什么，怎样干预，程度总有高、大、深与低、小、浅的差别。不论高低大小、深浅，都得讲良心，说实话。百人百口味，话说得极可能不尽如人意，但只要有读者表示认可，便算收到社会效益。作者能力有大小，大有大效益，小有小效益。读者看了感到“过瘾”、“解气”、“解决问题”固是效益：能在某些方面声气相通，使人微笑颌首也是效益。见报出书固能产生效益；写了给朋友看看，也未必没有效益。达到一律是不可能的；看死看绝是不合适的。就此争论意义不大。我将用习作的实践来反映我的观点，谋求收到社会效益。

所说的效益，是指有助于社会进步。这是无须多言的。

假如我是杂文家，在行文上将力避与政论有相近甚至雷同之处。杂文毕竟是文学范畴中的散文，尽管有些内容政治性强一些，仍要努力用文学手法来处理。它很大程度上是逻辑思维的产物，但因常是从生活中采集创作材料，本身就带有形象性的成分。如果执笔时有意、无意将其扬弃，那是很可惜的。我觉得还是带点美感为好，说句狂妄的话，即便

有“教”的意图，也要“寓教于乐”。这和写小说，演戏剧没有什么不同。文章总得让人家看得下去。

政论则纯属逻辑思维的产物。有时也有点形象，那是为了吸引人，用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是外掺，而不是溶入。我希望做到写作杂文能使逻辑、形象二位一体，即带着生活或书本中的形象思考问题，形成观点；进而带着形象去表述观点。我知道这不容易，但一定努力追求，假如把杂文写作与政论写作等同起来，同用一副笔墨，那将没有杂文。一篇内涵丰富、分量很重的社论、“本报评论员”或理论文章，就把那样的杂文全部包容了，何需杂文作者亦步亦趋跟在后面再去重复呢？

假如我是杂文家，基于上述同样理由，我将不再那样刻意地急于“贴近生活”。杂文固然是时文，但总要在生活中有所发现，不去老是重复人家已经说过的话，或者说，总宜结合一些自己所历所见的实际吧。我不准备急于跟着变化了的形势和新政策、新消息跑。要多看看、多学学、多想想，搞得心里踏实一些，直到产生执笔的欲望。判了“二熊”，就马上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提倡廉政，就急忙去写海瑞的作风，这类文字我写得不少。后来渐渐认识到，既当做文学作品来搞，就不必那样“急功近利”。放从容一些，思考得深一些，概括得广一些、也许能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得好一些。

我也无意去当“事前诸葛亮”，当然也不甘于当“事后诸葛亮”。这

“事前”与“事后”虽然都不是绝对的，但相对的总还存在。写篇人所未曾写（不管别人是否想过）的杂文而且切中要害，便应属当了一次“事前诸葛亮”。林放先生的《江东子弟今犹在》一文曾名噪一时，如果写作不是从文件上得到的启发，便应看成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是他个人独特的发现。警号的提出，对社会进步大有好处，这当然很不容易。对我来说，只能做到我行我素、我走我路、我思我见、我写我文。即使这样，也需付出很大的努力。

人既然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并享受着现实社会的赐予并为它做着贡献，思想就必然受到一切客观事物的影响和制约。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这样的范围中，观察、思考问题自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我拥护改革开放，但不拥护“改革文学”（当然包括杂文）之类的命题。这多少类似过去曾经有过的“写跃进、唱跃进”、“大写技术革新”、“表现农业题材”之类的提法。不仅不符合创作规律，且限制了作者的思路，使创作有了很大局限性，并容易导致“主题先行”、“图解生活”。“大写技术革新”的结果，是使作者更多地盯住机器和技术，而忽略了活生生的人和纷纭复杂的生活，于是就出现了“车间文学”，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才把这种文学现象基本扭转过来，所付代价是很大的。

指导思想正确，牢牢植根于自己生活的土壤，正视人生，目光四射，这样，不去执着地重复“改革”二字，笔墨中自有改革精神在。

“写什么，怎样写，是作家自己的事”。这个已经重复过多次的话，至今仍应具有权威的指导作用。当然有前提，那是义在其中的事。杂文当然也包括在内。所以我要着力去写自己想得比较透、愿意去写、当然也是于社会有益的东西，主观设想与客观评价常常会有相悖之处，所以我欢迎指教、帮助，同时也不介意背后的议论以至嘲笑——那是人家的自由。

假如我是杂文家，我将努力摆正自己和服务对象的关系。“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命题是错误的；企图用笔去塑造、改变他人灵魂的思想是狂妄的。教育他人，不如教育自己，争取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老老实实的人。我本极平凡，却也曾自以为高明，想充当个教育者的角色，现在想来，实在荒谬可笑。我应该是将把自己思想、心灵、观点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的人，和读者“侃大山”的人。心平气和去“侃”，力戒高人一等的思想。即使对我所憎恶的腐败现象、腐败分子，我也不想再搞得那样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我是和读者“侃大山”的，希望他们也有和我憎恶腐败的共同心态，所以需要平等地“聊”。至于那些腐败分子，杂文对他们没什么用处的，腐败入骨，小小杂文岂奈他何？冷冷一笑，依然“他行他素”。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用什么方式，一记暗器将我打昏，反而拿不动笔杆了。这很不值得。

假如我是杂文家，我将努力寻找自己，争取有点个人特色。首先争